

【人生随想】

□于冠霖

# 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奉献生命和享受生命。前者就是为社会、为他人做贡献;后者就是行使享受生命的权利,亦即享受人生的幸福。

在报端常见这样的论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生命的厚度和宽度。所谓生命的长度,是指寿命长短。所谓生命的厚度和宽度,是指在一定时间里所做的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或曰贡献。其论据多以诗人为例:王勃、李贺都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他们的诗篇却光耀千秋。而许多平庸的人,尽管寿命不长或者很长,因没有给后世留下什么值得记取和怀念的东西,他们人生的价值就无从谈起了。

好像有些道理。细思则以为有值得商榷之处。以下是我的两点看法。

其一,一个人其生命的长度与厚度和宽度是统一的。

一个生命之所以能够有其——按照论者的说法——厚度和宽度,也就是能够对社会和他人做贡献,必须以有一定的生命长度为前提。一个刚刚落地就不幸夭折的婴儿,即使他(她)能够长大成人的话可能会是怎样的天才或能手,然则他(她)既然夭折,不具备为社会和他人做贡献的最起码的生命长度,岂非没有生命的厚度和宽度可言了?

有个成语曰“大器晚成”。大器者,大才之谓。大才对社会和他人做出的贡献,自然比中才和小才要大,其生命的厚度和宽度,当然也比后两者要大。然则这里的一个“晚”字,又必须以较长的生命长度为前提。倘年纪轻轻就不幸离世,所谓“晚成”也者,也就谈不到了。据知,季羨林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是七十岁以后写的。“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

士。”假如这位梁老先生在八十二岁前去世,历史上岂非就没有他这个状元了?

像王勃、李贺这类英年早逝的才俊,历史上代有其人。他们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和他人所做的贡献,的确比许多其他较他们寿命更长的人要多。然则,假如他们不是英年早逝而是有着更长的生命长度的话,是不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从而使自己生命的厚度和宽度进一步增加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假如李白和杜甫不是比王勃、李贺多活了几十年,他们是不是还有诗仙、诗圣的桂冠,恐怕就难说了。

由此以观,人们在谈论人生价值的时候,把生命的长度与生命的厚度和宽度割裂开来,是不适宜、不妥当的。

其二,按照上述论者的说法,一个人,当他(她)丧失了为社会、为他人做出有益贡献的能力之后,或者离休退休之后不再有所作了,他(她)的生命,也就是他(她)的继续生存,就没有价值了。没有价值的生存,当然就没有了意义,岂非没有了继续活着的根据?我不这样认为。

人生在世,当然应该努力做出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贡献。这是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然则,这并不是人生价值的全部。人既然来到世间,就有其享受生命的权利。这是造化的或者也不妨说是上天的旨意。实施这种权利本身,纯然享受自己的生命,也是人生的价值,只要他(她)是靠自己的合法收入生活,不损害社会和他人。

我们的古人是讲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大千世界,包罗万象。仅拿生

物当中难以计数的野生动物来说,排除了人类的视角,而从造化的视角或者也不妨说从上天的视角来看,实在很难说它们的存在对生物界有什么有益的贡献。虽则如此,难道能够认为它们没有生存的价值吗?何况人类。

人生的价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奉献生命和享受生命。前者就是为社会、为他人做贡献;后者就是行使享受生命的权利,亦即享受人生的幸福。此或即古人所谓“生可以生,天福也”。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中到一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如果享受生命亦即享受人生的幸福没有价值的话,又该怎么理解党的宗旨的价值呢?

一般说来,世人的生都有奉献生命和享受生命这两个方面的价值。两个方面的价值不是截然分开的。人在奉献生命亦即在为社会、为他人做着贡献的时候,也在享受着自己的生命或曰享受着人生的幸福。不仅如此,至少对有些人而言,他们奉献生命亦即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贡献本身,也是或更是享受生命或曰享受人生的幸福。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其人均预期寿命的长短,是衡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高下的重要标志。长寿是福,高寿者被称为人瑞,即使他们已无力为社会、为他人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国人的共识。难道是偶然的吗?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在印刷术尚未使用的时期,以书法形式保存大型经典的载体,不是廉价的竹简木牍和昂贵的丝帛,也不是庄严肃穆的青铜钟鼎,而是一块块坚硬、沉重、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的石碑。试想,还有哪一种载体的文字比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更具可信度和持久的传世能力呢?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和佛道经典。无论在书法史上,还是在学术史上,其意义均十分重大。正是因为这种形式的深入人心,后来即使印刷术高度普及了,刻写石经的传统还是被继承和延续下来。

迄今可考的儒家经籍石经共有七种,其中,以《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最为著名,被称为儒家经籍“三大石经”。

《熹平石经》的经文是用当时的流行书体隶书体写成的,又叫“汉石经”、“一体石经”,是我国刻于石碑上的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破坏和此后长达百余年的古今文经学之争,致使汉代经学家各执一端,甚至出现了行贿篡改兰台漆书中经文的

【碑刻漫话】

## 重量级的儒家经书：“三大石经”

□杨加深

现象。有鉴于此,熹平四年,在蔡邕等人的奏请下,汉灵帝召集蔡邕、堂溪典等人正定六经文字。该工程历时九年,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等经书严格校勘诸家异同后,汇刻在46块石碑之上,除《论语》外,均立于洛阳学馆。该石经共计约200911字,是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一次儒家经籍校勘和刻石工程,在去伪存真、为读书人提供经典范本和开创后世经典上石方面开创了先河。

据《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种因观看石经而导致的车水马龙、道路拥塞的现象:从书法史的角度理解,这很像是当今名人的一次大型求书展;而从校对经文的角度看来,又十分类似于当今高考前学生们竞相阅读权威参考资料或标准答案。

可惜的是,《熹平石经》经黄巾起义、董卓兵燹、永嘉之乱后已毁大半,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已毁灭殆尽。近人马衡《汉石经集存》中所录石经文字仅八千余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的一块《易经》原石,正反两面共计491字,被认定为蔡邕笔迹,弥足珍贵。

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立于河南洛阳的《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经文,共二十八块碑,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部石经。该石经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刻写,在书法史和汉字演进发展史上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该石经也未传世,北魏孝文帝时期曾用来建寺庙,使之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目前所见拓本皆为宋拓。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和民国十一年(1922)两次石经残石的发现,才使我们得见该石经原石之一斑。该石经中的古文字体素为世人推崇,是研究战国古文字的重要资料。从三种书体看,该碑文显然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因原碑损毁严重,书写者究竟为谁,尚无定论。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中国历史上的第三部石刻儒家经典《开成石经》,终于竖立在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读经者抄录校对的官方标准。该石经开刻于太和四年(830),书写者有艾居晦、陈介等,碑文标题用隶书,正文用楷书,内容包括《周易》、《尚书》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石碑计114块石碑,双面刻字,共计650252字,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

《开成石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虽经黄巢起义、五代战乱,但在有识之士的保护之下,至今保存完好。北宋元祐二年(1087),在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移至西安碑林,成为西安碑林最早的构成部分。

沉甸甸的石碑上,承载着中华民族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石经是“世界上最重的书”,但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分量,又是石头的重量本身所远远无法比拟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行走笔记】

□邓撰相

# 在京都岚山公园谒拜周总理诗碑

诗中表达了周总理的情思:花开花落乃自然法则,但人应该在短促的一生中追求真理、有所作为,就像绽放的樱花那样绚烂。

可能天公理解中国人对周恩来总理的痛悼之情的缘故吧,就在我们去京都岚山公园谒拜周总理诗碑时,天空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京都位于日本的西海岸,又叫“西京”。自公元794年至1868年曾经是日本的首都,有“千年古都”之称。城市建筑平整舒缓,自然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整个城市仿照唐朝中国长安的城市布局和风格而建,是中日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型,城市面貌至今保持完好。为了保护古都风韵,整座城市没有特别高大的建筑,多以三至五层楼为主。在二战后期,京都日本没有遭到轰炸的少数几座城市之一。其原因,据说是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为盟军圈定的一份必须保护的都市名单中,首先包括了京都。所以,京都那么多文物古迹经历了那样残酷的战争而能保存下来,梁思成先生功不可没。

岚山公园因岚山而得名。春日的岚山一片翠绿,中间掺杂着霞云般的樱花,显得格外妖艳。细雨中,我们沿着大堰川前行百多米,向右一拐,攀上一陡坡,右侧即是周总理诗碑了。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渐渐走近,只见硕大的诗碑坐北向南,横卧在一个高台上面。碑石高2.4米,长约两米,近似半圆形。碑石取材于京都鞍马山的鞍马石,这种褐色石头坚硬无比,作为碑石刻字能延年而清晰。碑身矗立在大小石块堆砌的圆台上。碑上用中文刻着周总理的诗:

雨中岚山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  
夹着几株樱。  
到远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蒙;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碑文由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书写,笔法凝重、流畅。诗碑的背面,刻录着周恩来总理诗碑筹建委员会委员长吉村三郎、京都府知事、京都市市长和十几个日中友好团体的名字。诗碑左前方卧



有一块刻有日文的小碑石。导游向我们介绍说,上面记载着建立这座诗碑的缘由:“为了纪念一九七八年十月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为了表达京都人世世代代友好的心愿,在这渊源深远之地,建立伟大的人物周恩来总理的诗碑。”

伫立碑前,我思绪奔腾,不由地缅怀起一代伟人的历史足迹来。

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面对当时苦难深重的祖国,为了寻求挽救国家危难、解除民生痛苦的真理,南开中学毕业后,便“大江歌罢掉头东”,毅然东渡留学日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周总理在日本一面参加留学生办的“新中会”,从事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活动,一面挤出时间,研究正在涌向东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等。1919年1月,他在《社会问题研究》半月刊上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文章,从迷惘中获得启示。从当年4月起,在最后半年时间里,他准备学习京都大学河上肇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向京都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此时,正处“五四”运动前夕,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改变决定,“返国图他兴”。清明节前夕,即4月5日,和马洗凡、杨扶青、张子纶(就读东京水产讲习所)等人于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的于树德、安体诚等新中会的会员小

聚,然后一起冒着小雨畅游了京都西郊著名的风景区——岚山公园,其间,即兴吟出了《雨中岚山》、《风雨岚山》、《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等三首诗(第二天又写了一首《四次游园山公园》)。《雨中岚山》是其中的一首。诗中表达了周总理的情思:花开花落乃自然法则,但人应该在短促的一生中追求真理、有所作为,就像绽放的樱花那样绚烂。

从日本回国后,周恩来便参加了“五四”运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终成一代伟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受日本人民的敬重。1979年1月22日,为纪念周恩来总理,京都各日中友好团体和知名人士联合倡议,成立了“周恩来诗碑筹建委员会”。4月16日,诗碑建成。据资料记载,1979年4月16日,诗碑揭幕那天,《雨中岚山》抒怀问世整整六十年后,也正是樱花一年一度盛开如云的日子,日本各界人士不仅从京都,而且从北海道、东京、九州、神户、大阪、奈良、志贺等地远道赶来参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也应邀率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日,为周总理诗碑揭幕。随邓副委员长来访问的全国人大访问团成员赵朴初写下“从此岚山留胜迹,弟兄相见更相亲”的诗句。从此,凡到岚山的中国人,都会来寻访这座诗碑。

(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专家)